

# 翻译研究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孙宁宁

(河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翻译研究得以借鉴女性主义思想,扩大其研究领域,重新审视翻译活动的诸多问题。而生态女性主义的崛起,使得翻译研究在关系论、整体论和多元性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理论话语。

**关键词** 生态女性主义 翻译研究 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7)01-0042-03

1990年,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拉菲弗尔合著的《翻译、历史、文化》一书的问世,标志着译学研究正在经历着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转向<sup>[1]</sup>。这种转向将翻译视为写作实践,并且将翻译界定为一个传介过程,它不是超越于意识形态之上而是穿行其中,而女性主义学者也认为语言是意义争夺的场所,是主体检验和自我证明的竞技场<sup>[2]17</sup>。因此,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翻译研究在很多重要方面受到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随着生态女性主义的出现,翻译研究也将推倒男性中心主义和推翻人类中心主义作为其研究目标。

## 一、生态女性主义的演变与影响

女性主义(feminism),又称女权主义,西方女性主义文化诗学经历了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心路历程,从争取女性权力,强调性别政治,颂扬女性本质,讴歌女性形象,倡导女性文化,书写女性美学,建构性别理论,以性别与政治关系为中轴开展女性批评,走向抹去平面和边缘,拆去贵妇之门而走向大众,重视“他者”妇女,批判西方文化中心而广涉东方和第三世界妇女批评,反击白人中心而关心黑人妇女文化和文学,在新的层次上,以平常心做平常人,反对形而上学而看重阶级、阶层、种族、民族和地理等的分析<sup>[3]</sup>。

生态主义运动萌芽于19世纪,出现了浅层生态运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高潮,产生了深层生态学。深层生态学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倡导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念,认为生态系统的整体中,每一部分均平等生存,拥有各自的价值,多样性原则和共生

原则是深层生态学的基本原则,其整体有机论强调世界的整体性,认为自然界中的所有物种都具有不以人的好恶为标准的内在价值,倡导适度的、自我节制并注重完整性的价值观,以实现世界观和价值观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变。女性主义与深层生态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女性主义者认识到各种形式的压迫与不平等都不是孤立的,女性也应担负起保护生态的使命。但女性主义也认为深层生态学在批判人类中心论时并没有看到男性中心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因此生态女性主义作为女性主义与深层生态学之间的新的平衡便应运而生。1974年,在《女性主义的毁灭》一书中,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奥波尼(Francoise d'Eaubonne)第一次使用了生态女性主义一词。

生态女性主义不仅拓展了传统的女性主义理论,而且反对性别压迫以及人对自然的压迫,提出要重新建立男性与女性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根除价值等级制度观念和二元思维模式,在关系论、整体论和多元性的基础上建立起崭新的理论话语。生态女性主义的目标之一是推翻人类中心主义的图腾柱的生态之旅,二是推翻男性中心主义的女性之路。这两个阶段是彼此紧密联系的,而不是孤立存在的。

## 二、生态女性主义翻译观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以鲜明的女性主义的身份政治兴起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这一大潮之中。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流行于加拿大,其主要代表人物有:Barbara Godard, Sherry Simon, Suzaane de Lotbiniere-Harwood, Luise Von Flotow, Gayatri Chakvorty

Spivak 等。按照女性主义的观点,传统的翻译观把翻译看作女人,认为译作依附于原作,译者是作者的侍女,既贬低译者和译作,又充满着对女性的歧视。翻译的女性气质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历史比喻,女人和译者一同被纳入弱势地位的话语。因而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提出要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主张译文享有与原文同样的平等地位,并且认为翻译应该包容更加广阔的意识形态领域。

生态女性主义在翻译观上与女性翻译观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生态女性主义翻译观也认为翻译是政治行为。1970年,凯特·米勒特(Kate Millet)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应运而生,该书旨在清算文学中的性政治,它从政治视角审视两性关系,对男权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彻底地批判。受此影响,女性主义翻译观提出翻译是一种政治行为,在翻译中也应该争取女权,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标就是要识别和批判将女性和翻译一起逐入社会和文学底层的各种概念。

从欧洲中世纪开始,因为长期被排斥在著书写作的特权之外,妇女就把翻译作为一种被允许公开表达思想的形式,翻译便成了妇女进入文学世界的途径。例如,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在以小说家扬名于世之前,一直被称为斯特劳斯(Strauss)的女译者。翻译也是妇女参与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例如反对奴隶制的运动等。女性从事翻译活动就是为了建立起一系列的交流网络,进而服务于进步的政治议题。例如19和20世纪的法国、俄国、德国现代主义的伟大作品中,许多是由女性翻译的,通过翻译,她们表达出自己明晰的政治信念。

当代女性主义的《圣经》翻译,也反映出翻译是一种政治行为。女性主义表现了《圣经》翻译可以采取另一种社会和意识形态的立场。对《圣经》作女性主义及两性兼容语言(inclusive-language)的阐释所引发的争论,在让人注意到性别化语言带来的冲突性含义的同时,也加强了我们对翻译作为内容丰富的阐释活动的理解。一方面是强烈要求出版两性兼容语言的《圣经》译本(这导致牛津大学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了《新约》和《圣咏集》的此中译本),与此同时,也有女性主义者坚持呼吁出版更具有历史根基的译本。《圣经》的漫长历史放大了其翻译问题的重要性,也显示了这些问题的意识形态性<sup>[2]14</sup>。

其次,生态女性主义翻译观也认为要消解性别歧视,提高翻译研究地位。女性常常处于话语的低级地位,一直以来翻译也被贬入社会和文学底层,在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中,原作往往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强悍力壮的男性,而译作却是低下、柔弱的女性,译者因此也被置于话语的低处,处于女性的

位置,翻译于是成了媒婆,而原作却是处女。《通天塔:语言与翻译面面观》是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代表作,自1975年面世以来一版再版,成为战后翻译理论界影响最为广泛的权威性的翻译理论专著。斯坦纳在该书中将翻译过程分为信任、攻占、吸纳和补偿四个过程<sup>[4]13-319</sup>。在这个过程中,原作作为男性始终是主体,而译作作为女性却是客体,其理论中隐藏着一定的性别歧视。此外,一些男性生理词语也在该书中堂而皇之的多次出现,如ejaculation, impotence, semen<sup>[4]14</sup>,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作者的大男子主义情结。因此,要消解歧视女性和翻译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第三,生态女性主义翻译观也认为要重释忠实,倡导叛逆。传统的翻译观把翻译看作是一种再生产行为,通过翻译,文本的意义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这种陈旧的二元翻译观,把原作和译作当作两极,把忠实作为翻译的首要原则。女性主义学者戈达尔德(Barbara Godard)强调指出,旧的翻译观消除了文化痕迹和反射自身的元素并且剥夺了译本的事件基础,译者被视为一个仆人,一只看不见的手,机械地将词语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sup>[5]30</sup>。其实,翻译的忠实是相对的,翻译中的对等是不可能要求一一对等的,翻译的过程应当被视为一种意义的流动生产,而不应要求译作对原作的绝对忠实,就好比不应要求女性对男性的绝对服从。因此,戈达尔德主张女性通过或可被称作转化的身份诗学以笔发挥主观能动性作用。女性主义译者坚持维护她那根本性的差异、她那无穷尽的再阅读和改写的快乐,把自己对操纵文本的标记昭示天下。翻译中女人对文本的驾驭,意味着她要取代那个谦虚并且自惭形秽的译者。女性主义话语把作为言语行为的转化表现为翻译的模式,这是同基于一种透明诗学且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对等翻译理论相抵触的。女性主义翻译观认为原作和译作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翻译不是再生产而是生产活动<sup>[5]30-91</sup>。翻译也不是机械性的符号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女性主义译者认为应从女性主义视角重新审视原文文本,若原文文本与女性主义观点相悖,她们有权对原文文本进行干涉和改变<sup>[6]24</sup>。这里,干涉和改变实质上就是倡导创造性叛逆,是对原文文本的重新改写。

最后,生态女性主义翻译观也呼吁要凸显译者主体性。传统的翻译观强调译作与原作的忠实等值关系,过分强调译者的隐形,忽视了译者的主体性。女性主义翻译观认为要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凸显女性在主体中的地位,反抗文本的男性中心主义以及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指出翻译是译者传达、重写和操纵文本的过程。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而且也是操纵的工具<sup>[6]3</sup>。为了突出译者的主体性,更提出了翻

译是写作的高级形式<sup>[7]</sup>。认为写作和翻译都在意义的流动生产中凸显了女性的主体性。

为了让女性的身影在译文的字里行间被看到,加拿大著名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路易斯·冯·弗洛图(Luise Von Flotow)提出从女性主义角度进行重写,有意识地对文本进行干涉和改写。为此,弗洛图提出了女性主义翻译的三种翻译策略:增补、加写前言和脚注以及劫持。增补是译者为了弥补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而进行的创造性改写。其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在《圣经》翻译中,在 Brothers 前面加上 Sisters。而加写前言和脚注是女性主义译者从女性主义价值取向出发,对文本进行干涉,以说明自己的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阿伍德(Lotbiniere-Harwood)在译者前言中阐述道: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替女人说话。因此,我在一个译本上署名意味着:这一译本使用了所有的翻译策略,要使女性在语言中清晰可见<sup>[2]326</sup>。“劫持”则是女性主义译者在对原文中与女性主义观点相悖的词句进行干涉并在译文中改写。如阿伍德在对丽兹·高文的《女人的信》进行了“劫持”,作者在其文本中使用的是全称阳性词,译者将它们改写为了阴性词。

生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学者的目标之一是推倒男性中心主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学者揭示了翻译研究中的性别歧视问题,阐述了女性主义译者所采取的积极行动,如对译语的性别标记进行处理,使女性显现于译文之中。西蒙(Simon)指出:“当代女性主义翻译已将性别问题变成了有意识地改造项目的工地,这类项目可以改造文本权威性的状况<sup>[8]</sup>”。在这一点上,生态女性主义译者进一步继承和深化了女性主义译者的努力。

生态女性主义译者与女性主义译者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其第二个目标,即推翻人类中心主义并彰显于翻译之中。以中国译论的发展演变为例,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译论面临着文化翻译的身份认同以及翻译理论研究本身的身份认同危机,中国译论的出路在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古今结合、中西结合,中西融合是将中国文化中心论和西方文化中心论这两个中心加以结合,按照生态女性主义译者的观点,为了维持地球生态体系的平衡,在关系论上,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同处于世界文化的多元体系中,是这一多元系统中的二元,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应是对立关系,而应是和谐共处关系。从整体论而言,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作为多元系统中的一元,应维护世界文化多元系统的整体性,而不是各自为政。从多元性而言,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应是多

元共生的关系,中国文化应还原为多元中的一元,以世界文化所有成员为参照系,凸显其主体性,关注主体间性。因此,中国译论应发挥中国文化的个性,既不能一味模仿西方文化,也不能全盘否定中国文化,而应当突破、超越、创新,在寻求翻译普遍性基础上,保留独特性,构建中国译学理论的新范式。

### 三、结 语

美国著名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一个科学理论一旦达到范式的地位,要宣布它无效,就必须有另一个合适的候选人取代它的地位才行<sup>[9]</sup>。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范式的不断更替与演进。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产生,既是翻译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有其局限性与不足之处。它颠覆了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传统译论,使译者的主体性得以凸显,对翻译的政治也日益关注,但其过于激进的观点,过分强调了翻译中译者的干涉作用,因而导致了译者主体意识的过分张扬,不利于构建翻译学的理论体系。而生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虽然从关系论、整体论和多元性上提出构建多元文化的和谐关系,但是要实现在人类内部对所有人生存权利和生存利益的尊重并彰显于翻译之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参考文献:

- [1] 孙宁宁.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后殖民批评[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3): 71-74.
- [2] 许宝强, 袁伟.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 [3] 张首映. 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493.
- [4] GEORGE S.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5] BABARA G. Theorizing feminist discourse/translation[C]//Susan Bassnett & Andre Lefever.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Limited, 1990.
- [6] LUISE VON F. 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7] SUZANNE JILL L. Translation as subversion: on translating infant's inferno[C]//Lawrence Venuti. 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2: 79.
- [8] 赵彦春. 翻译学归结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61.
- [9] 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金吾伦, 胡新和,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71.